

现实发展与 精神超越

徐 圻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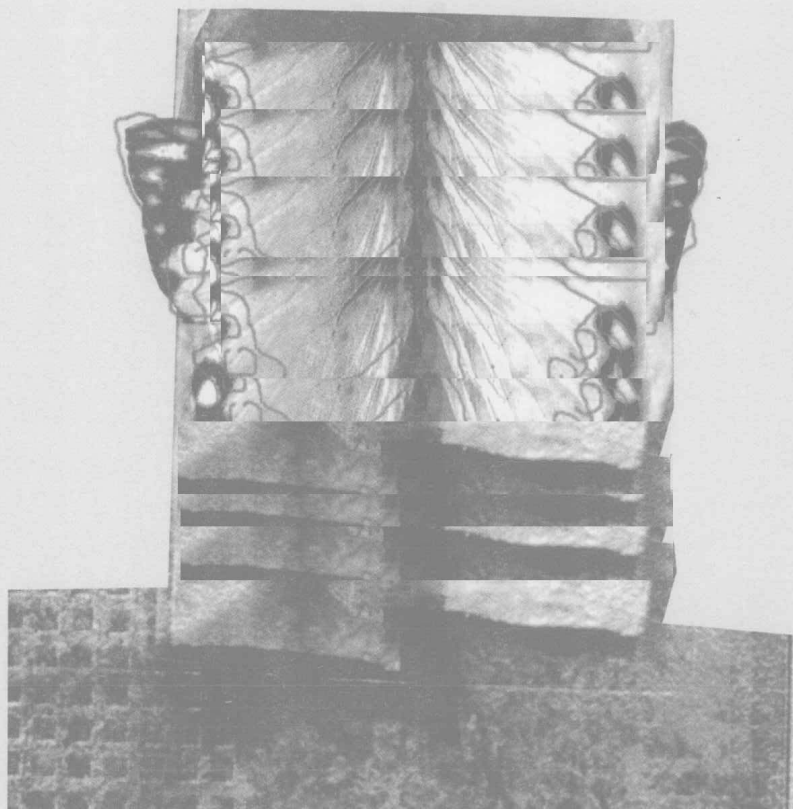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社

现实发展与 精神超越

徐 圻 / 著

重庆出版社

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
省长专项资金项目
(2001 年第 5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实发展与精神超越/徐圻著.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3.12

ISBN 7-5366-6427-3

I. 现… II. 徐…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0814 号

现实发展与精神超越

徐 圻 著

责任编辑 杨亚平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50 千 插页 2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66-6427-3/C·98

定价:24.50 元

自序

身为贵州的学者,当然要研究贵州的问题。但是对我来说,此事却有一个过程。在相当长时间里,我基本上算一个“书斋学者”,即是研究“纯学术”的人。这主要是我过去长期从事比较单一的业务工作所致。自大学毕业后,我就在高校做教师,先是教西方哲学,然后研究西方哲学。这是一个高度思辨的学科,大部分时间进行的是“形而上学沉思”,研究的基本上是与哲学本体论、知识论、价值论等有关的问题,因而不能不与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及日常生活相距甚远。在这个领域里,我可以让自己的思想自由驰骋,在阅读和思索从古至今的各种哲学家、哲学流派、哲学运动、哲学论争时,在围绕他们与同行进行交流、碰撞中,我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思想历练和精神享受,但与此同时,却使自己的思想愈发难以落到现实生活的地面上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自己资历的增长,我的学术视野不断扩大,思考也不断深化,逐渐从比较专门、比较狭窄的领域走向较为一般、较为宽阔的哲学问题,从西方哲学扩展到整个西方文化,从古代延伸至近、现代乃至当代的各种哲学、宗教和文化问题。再后来,我的学术兴趣又转向了中西哲学和文化的比较性研究,在生命感悟、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自我定位、审美趣味、人际架构等方面做了一些思考,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总的来说,我仍

然是把自己限制在与当初从事的西方哲学及其相关的领域内进行学术活动。我曾经坚定地把自己定位于做一名“真正的学者”，即主要对那些纯粹的学理问题进行探究，除非必要，不去染指“形而下”的问题。我一直认为，如果使学术与现实发生过多的牵连，就会损害了学术的高雅和纯洁，在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日益显得无坚不摧的情况下，尤其应当保持这份精神上的洁净。当然，作为生活在现实其中的一个普通人，我不可能对社会上，尤其是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但我认为，关注现实是一回事，而研究更不用说设法去解决现实问题，却是另一回事。

这种孤芳自赏、自视清高的心态，是在我的工作性质和环境有了改变之后才发生改变的。1999年，经组织调动，我离开高校，到社科研究部门工作，不久又被派到地方党委挂职锻炼两年。现在看来，这两年对我来说远胜于读10年书，对于我这个书斋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一场思想的洗礼，其意义是怎么估计也是不会过高的。在这期间，我了解到了原本不甚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的许多事情，尤其是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我了解了作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当前最关心的是些什么事情，我理解了作为我国欠发达省分的贵州为什么必须加快经济的发展，才可能在其他方面有更大的作为。我认识到，真正有良知的学者必须同时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他应当对改进生活现状有所作为，他不能固守清高，必须走进现实，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要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参与现实生活的过程中让自己的思想得到升华。就这样，我逐渐改变了自己长期以来对学术及其价值的理解。我现在仍然认为，学术性、思想性、创新性、深刻性等等，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力所在，是一个学者必须加以追求的目标；但是，学者的另外一项重要使命，是以他的思考、研究成果去积极地介入现实，通过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来建设性地改变现实。从此，我便开始用越来越多的精力来关心、思考和研究世界上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

自序

事情，其中当然就包含了对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的关心、思考和研究。我愈来愈感到，贵州的发展与自己的现实生存和未来进步密不可分，这不仅因为贵州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根，而且因为贵州是一片有着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在中国发展大局中日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热土。

2001年，我以“贵州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研究”为题，申报“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长资金”并获得立项。这就是本书的最初成因。

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围绕贵州发展问题进行的多方面探讨和思考，这些探讨和思考虽与具体的发展个案并无太直接的关联，却尽量从深层次或宏观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并力求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些可行或可能的思路，以便促成人们对影响贵州发展的某些较为普遍也较为深层次的因素（特别是经济以外的因素）进行思考。本书的其他部分，涉及了更为广阔、更为普遍的各种理论问题，涉及了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问题（重点是不同文化的比较价值和优劣取舍的问题）。本书当然也涉及了我的老本行——哲学问题（主要是当代哲学的一系列前沿性问题）。本书的最后部分，是我近年来的一些读书心得。

这本书当然谈不上系统性，但我可以说，所有的篇什都是对我自己独立思考的表述或表达。书中的不当见解自不待言，我除了负全部责任外，也欢迎读者的批评与教正。

本书的研究离不开贵州省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以“省长专项资金”的形式给予的大力支持，本书的出版是在重庆出版社的热情而周到的运作之下完成的，本书中的许多的想法和思路来自与朋友们的无拘无束的深入讨论。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徐 圻

2003年7月

目 录

自 序	(1)
-----------	-----



贵州发展篇

1. 必须着眼于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谈贵州发展的关键在于防“左” (3)
2. 成也在人,败也在人
——关于贵州省情的一种认识 (8)
3. 文化重构与观念更新
——从经济以外的角度看贵州的发展 (15)
4. 旅游中的文化困惑
——谈贵州民族风情的开发与保护 (19)
5. 用动态的观点看静态的历史
——谈贵州文化资源的解读与创生 (27)
6. 历史唯物论的新注解
——关于贵州实施“第一要务”的思考 (34)

7. 从观念的置换到资本的置换
——中小城市发展的一种有效模式 (42)
8. 解放思想是统一思想的前提
——从“哥白尼革命”想到中国及
贵州的思想解放 (53)
9. 从精神的解放到知识价值的释放
——谈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 (59)
10. 个性解放是创新的重要前提
——从水滴与大海的关系想到的 (63)
11. 道德建设与社会进步
——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 (67)
12. 走出行政运行的胀缩循环
——谈全球化进程中的人事改革 (77)



理论思索篇

13. 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合理性
——关于“三个代表”的思考之一 (85)
14. 唯物史观的当代表述
——关于“三个代表”的思考之二 (91)
15. 关于科学问题的几则随想 (98)
16. 道德完善是精神文明之本 (106)
17. 略论当今中国的道德状况 (111)
18. 实现“法治”与“德治”的互补 (122)
19. 法治胜于德治 (131)
20. 从《生死抉择》到生死抉择 (134)

目 录

21. 关于贫富问题的思考 (140)
22. WTO与我们的日常生活 (145)
23. 人与自然关系随想 (150)



文化反省篇

24. 略论当今中国的文化态势 (159)
25. 先进文化与“中国特色” (165)
26.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 (173)
27. 论全球化态势下的文化冲突 (177)
28. 以开放的视角看中国传统文化
——兼论“与时俱进”对于中国文化的迫切性问题 (204)
29. 谈作为一种文化理念的“个人主义” (221)
30. 从人性观的区别看中西文化的差异 (229)
31. 学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从“批判”、“反思”和“忏悔”的涵义看东西方
文化的差异 (240)
32. 爱因斯坦的精神 (250)
33. 超越实用
——关于高等学校素质教育的思考 (254)



哲学沉思篇

34. 超越性与哲学生命力 (261)
35. 谈谈辩证法问题 (265)

36. 关于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的思辨 (273)
37. 有益的“二律背反” (293)
38. 论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分野 (300)
39. 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理论得失 (309)
40. 差异与同一的对抗
——评西方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哲学的拒斥 ... (320)
41. 人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中心 (332)
42. 异化理论与现代化诉求
——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当代意义 (345)
43. 论作为“东方革命的西方理论”的马克思主义 ... (352)
44. 物的必然与人的自由
——略论马克思的平等观 (358)
45.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诠释
——评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 (368)
46. 巨人之间的哲学分歧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邓小平 (381)



文史心得篇

47. 贫困之中的充裕
——《瑶山研究》读后 (391)
48. 解读科学中的人文意蕴
——《知识与方法》读后 (395)
49. 成功的哲学漫游
——阅《西方哲学画廊》 (400)
50. 争取公平与效率的互补
——《社会工作管理学概论》序 (403)

51. 在权力与人性之间	
——读长篇小说《政界》	(406)
52. 求索者的轨迹	
——《云烟踪痕》读后	(412)
53. 有趣的历史偶然性	(419)
54. 人文关怀是出版之魂	(425)
55. 《三国演义》与民族精神	(429)
56. 自觉的异化与不自觉的同化	
——试论清朝前期统治方略及满汉关系的演变 ...	(434)



贵州发展篇

1. 必须着眼于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谈贵州发展的关键在于防“左”

贵州省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很多。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贵州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相当大,这一点,恐怕没有任何人看不到,也没有任何人不承认。关键在于找到造成如此大的差距的原因(特别是内在原因)。关于这个问题,全省上下现已形成共识,那就是钱运录在中共贵州省第九次党代会上指出的:“这些差距,主要是思想观念的差距和体制、机制的差距。”事实上,体制、机制的差距,说到底仍然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为什么沿海发达地区能够在多方面顺利实施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做法?诸如在经济体制与运行、管理与服务、就业与社会保障、干部与人事政策等等方面。为什么这些东西拿到贵州来就经常行不通或走了样?归根结底,是我们的思想观念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停留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种行政审批、大包大揽、部门所有、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些旧的思想框架之中,因此,问题的关键仍然是思想解放的力度和程度问题。正如钱运录所讲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自觉地把思想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

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决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干扰,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如此看来,反“左”防“左”,应当是贵州省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思想建设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让我们首先来澄清一下“左”这个概念。按最通常的涵义,左,指的是一种要求革新与进步、反对保守与落后的思想方法;右,则正好相反,指一种固步自封的、守旧的、反对变革的思想方法。因此,就一般意义而言,左代表了变革、激进、向前看的社会要求,右则代表了维持现状、不求进取、向后看的社会要求。在中外历史上,左与右之间的争论和斗争,一般都反映了激进与保守、创新与守旧、革命与反动、新兴与陈腐之间的争论与斗争。可见,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左是应当受到赞美的,因为它本身包含了与时俱进的积极意义;右是应当受到批判的,因为它本身包含了因循守旧的消极意义。

然而,在当代中国,左却具有了比较特别的涵义,以致我们在用它时,大多要用引号,即“左”。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在整整20年时间里,左这个概念曾经被极度地予以夸张,它的内容大大超过了其本身一般具有的积极意义,它的范围也大大地膨胀起来,不仅指一种思想方法,也不仅指特定的社会政治行为,而且成了一种泾渭分明的政治态度或政治立场,成了衡量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一切方面革命与反动的试金石。在那些岁月里,经济上的“左”,标志着生产关系的不断翻新,公有制程度的不断提高,因为人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正好相反);在分配上则是实行平均主义,即尽可能地削平人们在个人收入和生活样式方面的差别。政治上的“左”,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政治压倒一切、统摄一切、衡量一切,搞“灵魂深处闹革命”。文化上的“左”,标志着只能在最“纯洁”的状态下进行思考、抒发情感、从事娱乐,人们的思想与情趣必须“无产阶级化”,任何与之相抵触的

东西均属“低级趣味”，都应当加以批判与清除。

这种“左”有其思想上的根源，那就是固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革命导师的某些论断，以一成不变的态度对待不断变化着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社会生活中的人与事，一切“按既定方针办”，即凡是领袖、权威、经典说了行的，那就“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凡是领袖、权威、经典说了不行的，那就永远坚决不做。显然，这种“左”表面上十分革命、十分激进，实质上却透出了非常教条、非常僵化的内核，在根本上是一个保守的概念；极左的、冒进的东西最终走向其反面——僵化、保守，这一点在中外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正所谓“形左而实右”。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从发动中国的改革运动的第一天起，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这个带引号的“左”，他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8字箴言，他的“南方谈话”等等，要点都是反“左”防“左”。江泽民继承发展了邓小平这个一贯思想，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他在“七一讲话”中用“与时俱进”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针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解的，因而是反“左”防“左”的杰作。

如前所述，贵州省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主要是“思想观念”方面的差距。那么其表现何在？根本的表现，还是一个自觉不自觉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了教条式的理解，即自觉不自觉地固守着某些当年由经典作家们首创，或得到经典作家们肯定而在今天显然已经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这就是“左”，它是我们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大敌。因此，今天的反“左”防“左”，与当年“反冒进”的含义完全不同，恰恰相反，是要反对和防止那种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教条主义态度，而将变革、创新、发展放在首要的位置上来。

在贵州这样一个欠发达的省分，“左”的影响的确不能低估。比如，对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理解。尽管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

我们党对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定义、实现程度及实现方式进行了若干次重大的理论创新，但我省仍然有不少干部和职工仍然片面地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理解为一种“福利制度”，即用公平（实际上是平均）来涵盖并替代效率。又如，对贫富问题的理解，仍然有为数不少的干部、群众视有产者（富人）为洪水猛兽，他们只看见“资本的毛孔里渗透着血”，却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对剥削现象的有效调控与制约（包括使用政治和经济的各种手段），没有看到或不愿看到非公有制经济对国家税收和劳动力就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这也正是我国沿海发达地区迅速崛起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再如，对劳动价值和市场经济的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经过细致的分析和演绎，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生存、发展并必定走向灭亡的内在逻辑。但那毕竟是100多年前的事了，这期间，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发生，也包含了借鉴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国家干预和抑制贫富悬殊等方面的理论。另一方面，20世纪发生在前苏联的巨大社会试验，曾试图绕开劳动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经济行为的轴心，去开发出一种新的以计划配置资源为最大特征的经济模式（即不以劳动及其价值来支配经济行为，而主要以理想主义和行政手段来支配），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前苏联、东欧的失败和中国改革的成功，尽管结局截然不同，但从经济上讲，都是由于计划体制的崩溃直接导致的）。可我们现在不少同志却仍然认定，行政权力可以决定一切经济事务，而用不着考虑或用不着过多地考虑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哪怕在中国已经加入WTO，国际间通行的市场游戏规则马上就要在非常普遍的范围发挥巨大效力的今天，我们不少干部，甚至我们一些理论工作者仍然对经济全球化、对市场配置资源不以为然。他们意识不到，除非人类不再需要社会分工，否则，哪怕到了共产主义，交换也必然继续存在，市场也就取消不了，价值规律对经济生活的支配性作用也